

新加坡华语文教育的关键在于家庭

笔者从事的专业佛教文献学，对语言要求极高，因为佛教文献的经典语言是梵语、巴利语、藏语和佛教混合汉语，而此一专业的工作语言则是英语、日语、德语、法语，这还没有算上中古时期中亚地区的佛教经典语种，比如犍陀罗语、和田语、吐火罗语、回鹘语、西夏语、蒙古语和满语等等，所以我的外国同行或师友之中，能熟练使用四五种以上语言的人实在是指不胜屈。

然而问题在于，即使是对这些极有语言天份的人，华语及其文字依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曾经细细数过，在我的相关领域中，能够毫无障碍地用华语作学术报告的外国人，大概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学者梅维恒、本月刚刚转到牛津大学的意大利学者左冠明和在台湾佛光大学的俄罗斯学者索罗宁等数人而已。一位在美国大学修过七种以上语言的朋友，也曾以亲身体验告诉我，最难的并不是传统认为的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而是汉语和阿拉伯语。

华语为什么这么难，这在学术界是有过研究的，其主要原因不外是语音方面的调位，文字方面的非拼音系统，语法上没有明确易辨的形态变化，词汇上非派生构词法等等。尤其是与印欧语系相比，就显得过于变化莫测了，这种语言因此非常有表现力，但也使学习变得非常困难。我的母语是华语，曾主修过古代佛经汉语，但即使是我这样的专业人员，依然每每为读通汉语字面意思而苦恼，很多时候只能通过梵语、巴利语等印度原语，来对勘汉语的意思。

问题是一方面华语非常难学，另一方面新加坡华语教育又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即普通新加坡学生并没有一个好的学习华语的语言环境。以我正在读幼稚园一年级的女儿为例，她的同学之中各族皆有，平常的交流语言只能是英语，到了正式读书之后，这种情况依旧。

更糟糕的一点还在于，很多年轻人的家庭用语也是英语。因为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由于新加坡教育语言

的转向，与以前有一个巨大的华语交流的断层。这一代年轻人更倾向于用英语作为日常交流语，更可怕的是这一代青年又将这个断层转移到了200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了解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就应该将家庭中的华语交流和华文教育，当成一件当前应该解决的重中之重。只有将家庭中的母语交流环境重新培养起来，才可以彻底改变新加坡是在一个“没有普通话交流环境”的地方推广普通话的困局。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华语语言与文字是世界上最为难学的语种之一，尤其是与英语相比，后者实在是简单很多。但在实际时间与精力投入方面，下一代新加坡人却正好相反。我并非反对在英语上投入大量的时间，而是说华语教育需要比现在更多的投入，否则不会有好的效果。在学校期间，英语的主体地位当然不能动摇，因为这关乎新加坡的种族和谐以及国家经济政治的定位，剩下的关键就是在课后与家庭了。

我经常看到很多华族年轻夫妇在与孩子交流时习惯性地用英语，可能对他们而言，这更加方便，但这种思想上的一时怠惰，却失去了难得的潜移默化教育孩子的机会，让他们在孩子未来的语言训练中输在了起跑线上。语言的培养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如果父母在孩子年幼时的语言学习黄金期，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孩子就很难在将来有好的语言学习前景。

所以，如果新加坡真的想要致力于培养中英双语的人才，就应该把家庭这块语言教育的园地开发起来。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至于具体办法，比如是否需要广大媒体的支持与帮助，教育部华文课程为适合此一变化而做的相应调整，家庭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到华文教育之中等等，则需要政府与民间共同协商来加以推动。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